

# 大学课程不及格率高要整改？ 纷争背后教育观念待重塑

■ 张晓军

近日，浙江某高校教师在网络上曝光由于其教授的3门课程学生不及格率高于30%，学校要求该老师就此作出解释说明并提供整改方案。此事一经曝出，随即引起各方的关注及争论。

在笔者看来，如果简单地讨论学校、学生和任课老师之间孰对孰错，难免流于表面，也很难得出具有说服力的结论。要真正分析并解决此类问题，需要回到引发这一事件的两个根本问题上。

## 专业化的教学管理体系仍待强化

第一个根本问题是高校教学管理体系的专业化问题。

作为协调高校内部各方利益的核心机制，高校的教学管理体系是有效处理各类教学难题的基本保障。专业的教学管理体系能够有效平衡不同利益相关方的诉求，并形成多方认可的方案。

在此次事件中，如果从学生角度看，3门课程的课时少（涉事教师在网直言，其教授的3门课程总计只有112课时）而老师的要求不低，可能会给学生带来不公平；从老师角度看，坚守学术标准是其从教的基本职责；而从学校角度看，课程及格率过低确实会影响到学生的长远发展以及学校的绩效指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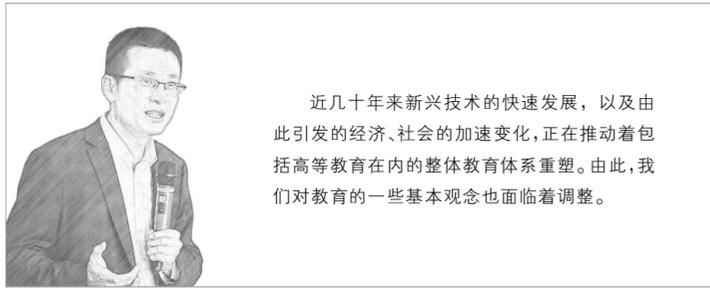
总之，几方的诉求均无可厚非。此时，学校就需要制定一套专业的制度和程序，在各方事先沟通、讨论、认同后加以实施。如此，一旦出现相关问题，便可按照制度执行。

在这方面，国内外的一些高校已有先例。比如，有些高校规定，如果一门课程出现超过30%的学生成绩不及格的情况，老师要从自身授课的角度分析原因。当然，此“原因”并不一定仅仅出现在老师身上，也可能是学生或者课程设置本身的问题。

对于老师的分析，学校要召开会议讨论。如有需要的话，可以邀请学生参加会议。会议应综合各种情况，对学生不及格率过高的原因加以判定。

在操作层面，一般要通过与其他院校的类似课程对比，分析该课程的考试难度，还可以对比这门课程的学生在其他课程中的及格率，以及对过去几年中，这门课程的学生及格率。

通过这些对比和分析，基本上可以得出各方都认可的结论，由此也就不难找



近几十年来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社会的加速变化，正在推动着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整体教育体系重塑。由此，我们对教育的一些基本观念也面临着调整。

到解决方案了。

比如，如果原因是课程课时与考试要求之间不匹配，课程的设计就需要进行调整，专业负责人自然成为主要责任者；如果是由于学生普遍对相关课程的学习兴趣不高、投入不够，任课老师和班主任就需要跟进关注；如果通过讨论，发现学生考试成绩不佳的原因在于考试本身难度过大，或者是一些与学生无关的因素造成的，有些国外高校便可能会整体拉高这门课程的考试分数，等等。

回到此次事件本身，从目前释放出的信息中，我们很难判断该高校是否有这样的管理规定——也许相关规定本就缺失，致使任课老师不清楚自己写说明意味着什么，因此愤而在网络上表达观点；也许学校已经有清晰的规定，但是任课老师对此并不熟悉；抑或是老师对所授课程的课时过少本就有意见，使得他不愿意遵循学校的既定程序……

具体是何种情况，作为外人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此处的关键在于应强化这种专业化的教学管理体系，并确保相关操作流程的专业性和学术判断的合理性。这样一来，不管发生什么问题都可以得到专业的应对。

## 基本教育观念面临调整

第二个根本问题是教育理念问题，即关于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的基本观念。

比如，学生上一门课的学习目标是什么？课程对学生的意义是什么？一门课程结束后，考试的意义是什么？教师的职责又是什么？

在笔者看来，课程的及格率和教育理念之间是息息相关的，对上述问题的理解则是决定课程不及格率的更深层问题。

当前，绝大多数人对上述问题的理解都受几百年来教育体系中主流观念的影响。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无意识地持有特定看法，并以此主导我们的学习和教学实践，从而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现象和问题，包括经常出现的不及格率高的问题。

首先，学生学习一门课程的目标，到底是学会大纲中规定的特定范围内的知识和理论，还是通过课程学习使自己在某些方面的成长更进一步？

在过去几十年间，我们的教学体系处于不断固化的过程中，身处其中的学生、老师乃至社会大众普遍认为，学生学习一门课程的主要目的是掌握该课程所承载的知识。如果我们持有这样的观念，在很多时候，考试作为一种达标测试工具，就是考查学生在多大程度上掌握了这些知识。

如果秉持此种观念，一旦学生由于没有掌握课程要求掌握的知识而挂科，老师自然不愿通融。然而，如果学生在课程内最重要的收获是其在某些领域内的成长，考试就会变成衡量学生成长幅度的一种方式。此时，教师关注更多的便是学生的“增值”。

其次，课程是育人的基本单元，但在育人过程中，课程发挥的作用到底是支撑学生掌握一个个设计精妙的特定领域的知识体系，还是激发学生对于特定问题的学习兴趣？今天，高校中的几乎所有专业都是由某个学科领域的几十门课程组成的，每一门课程又由更细碎的学科知识体系串联起来，学生在大学走一遭，主要的任务就是学会这几十门课程里的知识。然而，这样的体系是否能够有效支持每一名学生融入未来社会？学生以被动姿态吸收的知识，对他们的人生发展到究竟有怎样的意义？

针对上述问题，当我们把课程定位为学

生学习特定知识体系的载体，抑或是将其目的定位于激发学生对于特定问题的兴趣，课程的考核方式可能会截然不同，也会给老师看待自己的课程中学生的不及格率高带来的视角。

再次，在我国学生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实践中，考试都是天经地义的。似乎每学习一门课程，就需要一次考试。但是，考试的意义是什么？是衡量学生学习了一段时间的效果，是促进学生学习的一种手段，还是学习本身？

几十年来，国际上针对考试的研究主要分为三种类型——为了衡量学习目的是否达成的考试、为了促进学生学习的考试，以及本身便是一种学习活动的考试。可以看出，不及格率高的问题只有在特定的考试类型下才会出现。面向未来的教育应该采纳哪一种理念，或者如何在课程中融合不同的考试理念？这是值得每一位教育工作者思考的问题。

最后，我们也需要反思教师的职责。教师到底是学术标准的“守门人”，还是学生成长的“引领者”？尽管二者并不一定冲突，但是当出现学生考试及格率过低的情况时，教师应该如何平衡上述两种角色？学术标准和学生成长之间，该以哪个为本？二者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复杂关系？这可能是新时代教师修炼“教育家精神”时，必须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在很多人看来，以上四类问题的答案一目了然，因为今天的教育体系充满了根深蒂固的教育观念，导致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很多固有的观念。然而，近几十年来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社会的加速变化，正在推动着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整体教育体系重塑。由此，我们对教育的一些基本观念也面临着调整。

自2018年以来，我国先后推出的“一流专业”“四新”学科建设、“一流课程”等项目，都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新理念。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冲击下，全球范围内的教育体系也在不断重塑教育目标和实践的呼吁。这些都提醒今天的我们，要重新审视大家习以为常的想法和做法。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也许课程不及格率高这个问题本身就不会存在，或者至少让我们从新的视角看待这一现象，会得出与以往不一样的结论。

（作者系西交利物浦大学未来教育学院执行院长）

## 中国大学评论



包万平

青海师范大学  
高原科学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近期，包括中南大学、武汉轻工业大学在内的多所高校，相继召开管理重心下移改革工作推进会或深化校院两级管理改革推进会，以推动学校职能部门向学院放权的“院办校”改革，从而扩大学院管理自主权。

从内部治理架构看，大学虽是一个学术组织，但同时也是一个“权力场”，权力配置的不同引起大学最终的运行结果不同。若大学行政权力的配置强于学术权力，各类重要事务的决策重心就会在校级行政职能部门层面，这种模式是“校办院”，其最大好处是学校层面统管一切。反之，若大学学术权力的配置强于行政权力，各类重要事务的决策重心就会下移到学院、学科层面，这就是“院办校”，其好处是相信学院的力量，激发学院办学活力。

比如，学院要引进一名高层次人才或进行教师职称评审，按照“校办院”的做法，相关工作由学校统一控制，学院只具有建议权，教师能否被引进或晋升职称，决定权在学校职能部门和学校相关会议。而按照“院办校”的做法，高层次人才引进、教师职称评审指标全部下放到学院，教师怎么引、职称怎么评，最终决定权全部在学院，学校职能部门和学校相关会议只负责程序性保障，不涉及具体选人用人、职称晋升的决策。

相比之下，“校办院”模式的缺点比较明显——不但管理流程复杂、办事效率低下，更重要的是，以学校集体决策的名义，稀释了每个具体管理干部承担的大学发展责任。这就容易形成一种“责任不在我”的躺平式管理和发展思维，最终不但耽误了大学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具体工作，还耽误了大学乃至国家的发展。

为了消除“校办院”发展的弊端，有些省份曾专门出台文件，推进“校办院”向“院办校”的综合改革，也探索出了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一些大学在“双一流”建设中明确，要注重发挥学院和重点科研机构在办学中的主体作用，在人权、事权、财权等方面赋予基层更多权力。

在人事权方面，有些大学将职称评审权限和研究生导师遴选权等全面下放到学院，学院具有最终决定权，学校层面不再过问。在财权方面，一些大学的院系只要把经过审批的预算提交给学校备案，经财务处核定后，学校就可将所有经费一次性划拨给院系，并由院系自主决定使用等。

不过从整体看，国内大部分高校尚未实质性推进“院办校”改革，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其一，校级职能部门对核心权力下放心存顾虑。相关部门既对权力下放表示质疑，认为这不一定能激发学院的办学活力，又担心若权力下放到学院，某些校级行政职能部门存在的合理性就会存疑。

其二，权力下放中也会出现一些配套问题。在“院办校”改革中，最主要的是让学院拥有更多人、财、物等的核心办学自主权，对其他配套权力下放的关注度则相对不够，这就可能造成各类权力下放不同步，在操作层面出现组织紊乱。

面向未来，我国大学的“院办校”综合改革还需要从以下四方面加以改进。

第一，完善大学章程及制度体系建设，推动权力下放法治化。我国部分高校在探索“院办校”改革中，都强调管理重心的下移。但实际上，学院的办学自主权非但没有增加，有些学院甚至比之前承受的压力更大。因此，在综合改革中，应完善大学章程及配套体系建设，从制度上确认并保障学院的办学自主权，推动校级权力下放到位。

第二，构建学院内部治理体系。对学院而言，实施“院办校”改革需要一并优化学院的内部治理体系，建立有效的风险防控和监督管理机制，以形成学院内部自我管理和提升的协同治理生态系统。同时，还要强化学院的管理团队建设，把具有战略眼光、熟悉学科专业动态、善于谋划发展、能够调动资源、乐于团结师生的专家、学者作为学院管理骨干，以及“院办校”综合改革的主要参与者和推动者。

第三，有序推进权力调整。大学负责学校未来发展方向以及全局性、战略性关键问题的决策和管理；学院完成学校各项任务和目标，行使好各种下放的权力，如人权、财权、物权和事权等；学校行政职能部门主要承担“院办校”的服务保障职责，在学院办学遇到任何问题时，第一时间提供服务，所以这些部门在本质上是协调部门，没有实际管理权，不再进行领导签字、部门盖章等具有审批性的工作。

第四，推进学院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由于每所高校、每个具体的学院都是独特的，因此“院办校”综合改革不能用一把尺子，高校和学院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进行学院改革试点。高校应以办学目标、具体指标为依据，将协议授权和目标导向相结合，将行政部门的相应权力全部下放到试点学院。同时，为防止这种下放的权力被再次回收，有必要在“院办校”改革中，将行政职能部门的冗余人员、设备、办公用房等全部归并到学院。

# 大学综合改革的核 心是实现『院办校』

# 高校教师应积极拥抱社交媒体

■ 刘爱生 张旭慧

近年来，随着网络社交媒体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各类社交平台上生产、传播和获取知识。以知名网络视频平台“哔哩哔哩”（以下简称B站）为例，知识类内容已经成为用户最喜欢的视频类型之一。过去一年，共有超过2亿用户在B站学习知识，“上B站搞学习”成为年轻人的口头禅，该网站甚至被许多用户称为“中国哔哩哔哩大学”。

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7月5日，B站播放量最高的视频为山东财经大学教师宋浩的《高等数学（同济版）》，其播放量高达1.6亿次；粉丝数量最多的UP主（即在视频网站制作和上传视频、音频等的人）为科普刑法知识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其粉丝数超过3100万。

## 社交媒体重塑高教形态

以B站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将在许多方面重塑高等教育的形态与功能。

其一，打破课堂时空限制。在传统意义上，课堂教学仅限于师生在实体教室的面对面教学。社交媒体则打破了传统课堂的时空限制，任何一名大学生只要能接触网络，就可以根据自身兴趣选择社交平台的学习内容，并按照自己喜欢的节奏学习，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

此外，在传统课堂上，师生间交流与互动的受众，频次往往受限，但在社交媒体上，用户除了可以跟UP主互动外，还可以与国内外其他用户进行深入讨论和交流。

其二，创新教育教学模式。高校教师利用社交媒体进行教学，是对传统教学模式的一种创新和融合。通过视频、直播、弹幕互动等多媒体手段，教师能以更生动、直观的方式传授知识，激发用户的学习兴趣和动力。同时，这种新型教学模式还能促进师生间的交流和互动，增强教育的参与感和实效性，以及学习的趣味性和交互性。

更重要的是，B站上的弹幕功能能营造

一种浓厚的学习氛围，调动用户的学习主动性。这不仅丰富了教学手段，也为教育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and 方向。

其三，满足个性化学习需求。尽管目前高校提供了丰富的选修课程，国外名校的选修课数量甚至高达上千门，很多高校还制作了一批网络公开课，但相比社交平台上海量的知识内容，大学里的选修课数量仍是“小巫见大巫”。况且在大学提供的选修课（包括网络公开课）中，还充斥着不少“水课”。

年轻人之所以热衷于在B站上学习，就是因为其平台资源不仅丰富、易于理解，质量也很高，能满足用户的个性化学习需求。

其四，促进高等教育公平。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学生只有考入头部高校，才能最大程度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绝大部分群体则被排斥在外。头部高校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垄断显然不公平，而通过短视频社交平台传播高质量知识，则打破了这种垄断，使更多人能跨越地域、年龄、经济等界限，学习自己感兴趣的高质量知识。这种开放性和包容性有助于缩小教育差距，促进教育公平，使更多人有机会接触优质高等教育资源。

其五，推动网络文化建设。高校作为人才高地与思想创新高地，在舆论引导和网络文化建设中具有先天优势。社交媒体是推动我国网络文化建设的一大利器。高校教师在B站等社交平台上分享学术成果、生活感悟和人生经验，不仅为学生们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食粮和人生指南，也向更广泛的社会群体传递了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和文化理念。这有助于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推动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 应鼓励高校教师拥抱社交媒体

B站数据显示，2023年共有217万UP主投稿泛知识类内容，但只有645位教授、学者入驻B站。换言之，社交媒体上的知识生产者与传播者中，绝大部分为各行各业的

异质群体，高校教师只占极少数部分。

作为学历最高、知识储备最丰富的群体之一，高校教师理应在知识生产与传播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之所以有如此现状，其背后原因很多，如大部分高校教师忙于教学和科研，无暇顾及面向公众的知识需求；高校教师对社交媒体的恐惧和信息技术的陌生，致使他们对拥抱社交媒体缺乏信心和动力等。

鉴于国家推进网络文明和网络强国建设的需要，以及社交媒体已成为当代年轻人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政府与高校应鼓励教师走出象牙塔，积极拥抱社交媒体。

首先，当下的各类高校评价体系普遍以科研、教学为重要依据，高校的网络参与基本被忽视。大学作为教书育人和知识生产的中心，在评价中重科研和教学本身没错，但在社交媒体时代，教学的时空限制已被打破，教育教学模式不断创新，学生获取知识的方式日趋多样化，高校固守传统的评价体系已不合时宜。

建议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包括各类民间机构）在大学评估、排名中，应将高校及教师的网络参与纳入评价体系中，如此才能最大程度推动高校及教师主动拥抱社交媒体，在网络文化建设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其次，高校应不断完善教师评价体系，激发教师参与网络的内生动力。比如，某教师在社交平台播放量上百万甚至过亿的课程，是否有资格被认定为“金课”？某教师在社交平台阅读量达10万+的“网文”，在教师评价中能否与学术论文“平起平坐”？

在笔者看来，为激发教师参与网络的意愿与动力，高校可考虑设立公共传播型教师岗位。

尽管在多元评价的理念下，高校已设立了多种类型的教师岗位，如教学型、研究型等，但教师的网络参与（如在社交平台上的知识讲解或文化创作）很难被归入其中。鉴于此，高校可以增设赛道，为少数有志于网络传播的教师设立公共传播型岗位，以鼓励

他们“从一而终”。

最后，高校应提供技术与资金支持，提升教师参与网络的能力。网络课程的制作，单凭教师个人是很难完成的，这就需要高校联合相关社交媒体合力完成。

同时，“网文”创作也并非想象的那样简单。人们往往误以为，作为各自领域的“权威”，高校教师能很自然地将其研究成果流畅地传达给大众。诚然，部分学者在此领域表现出色，但大多数教师却面临有效传播的挑战——

一是他们长期浸淫于学术论文的撰写习惯中，脱离专业术语和数学符号的框架后，便很难将研究成果通俗化；二是人文与科学领域的思想往往深邃且复杂，并非简单替换为更浅显的词汇就能实现有效沟通。

然而，通过针对性培训，这一困境就可以被打破。美国部分高校在此领域的实践已经提供了良好范例。例如，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设立的“公共参与小组”，其核心任务之一就是会聚跨学科且具有丰富公共写作经验的大学教师（每期包含7~9名教师），为有志于提升公共写作能力的教师提供培训。

当然，对于高校教师加入社交媒体的潜在风险，我们需加以警惕。例如，在追求快速传播和吸引流量的过程中，部分教师可能忽视了对教育内容的严格把关，存在误导观众的风险；再比如，高校教师在制作和发布教学视频时，可能会使用他人的作品或素材，如图片、音乐、视频片段等，若未经授权擅自使用，可能会引发版权争议和法律诉讼。对此，高校应加强监督和管理力度，确保内容的合法性和准确性。

总之，社交媒体的崛起给知识的生产、传播和获取带来了新模式。高校及其教师作为知识生产和传播的中坚力量，在此过程中应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我们期待更多高校教师走出“象牙塔”，走进社交媒体，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影响广大“网民”。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